

对金融中心的遗产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在 1525 年的大教堂（Grossmünster）里寻找阅兵广场（Paradeplatz），未免犯了时代错置的毛病。苏黎世宗教改革是一场宗教运动，其领导者若发现自己的事业与私人财富管理联系在一起，想必会感到惊讶。然而，一个金融中心也由各种制度、习惯和声誉构成，正是它们使一个地方值得在那里存款、放贷和投资的人信赖。Zwingli 所奠定的体制中，有五个要素促成了苏黎世的这种环境。

第一是由市民控制教会的模式。苏黎世宗教改革确认，市议会是该市领地内一切事务（包括宗教）的主权机关。市议会通过公开程序、辩论会、条例和法院行使这一权力。市民权力成为秩序、道德和财产的保障者。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这一传统造就了一个在某些方面具有干预性——监督私人行为和商业——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十分可靠——保护财产、执行合同——的国家。现代瑞士把对私有财产的有力法律保护与对金融活动的严密公共监督结合在一起，这一结合有多种来源，Zwingli 式的市民权威与道德权威的融合便是其中之一。

第二是市民纪律。婚姻法庭、道德训令和宗教会议造就了一种文化：个人的行为，包括其经济行为，是公共关切的事项。交易中的诚实、义务的履行和不事炫耀，由公共机构强制实施，并为

对金融中心的遗产

代又一代的市民所内化。苏黎世商人和银行家后来在海外享有的稳重可靠的声誉，其道德根基就在于这种纪律，尽管其商业价值是在这种纪律本身早已松弛之后才被发现的。

第三是教育。先知学院以及由教会财产资助的学校，造就了识字的、在上层中更是有学问的人口。Carolinum 培养牧师，也培养商人和官宦家族的子弟。捐赠财富与公共教育之间的联系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当时大教堂教士团的资产为大学的创立作出了贡献——并延续至今：苏黎世的各所大学和理工学院为金融中心输送专业人才。

第四是印刷。Froschauer 印刷所使苏黎世成为印刷知识的生产者和出口者，并为该市留下了一个持久的出版、印刷以及后来的防伪印刷产业。从 Froschauer 到 Orell Füssli 的传承链条，把 1531 年的圣经与现代有偿证件的印制联系在一起。

第五是对以金钱收买政治影响的外国资金的警惕。苏黎世拒绝 1521 年的法国同盟，禁止外国年金，并处决了一名因收受年金而获罪的市议员，由此确立了一种对外国向公职人员付款的不信任传统。这一传统并非连续不断，因为苏黎世于 1614 年加入了法国同盟，其精英后来也像其他人一样从外国服役和对外贸易中获利。但它为该市提供了一套关于公共廉洁的话语——公职人员收受外国金钱即是一种腐败——这预示了现代对贿赂、利益冲突以及外国对本国政治影响的关切。今天，一位就瑞士关于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制裁或政治公众人物的规则提供咨询的律师，所处的道德视野是 Zwingli 会认得出来的。

与日内瓦的比较将在 B.IV 章中展开，但在一个方面已经颇具启发。在日内瓦，宗教改革与一个庞大难民群体的到来相关联，他们带来了资本、商业关系和世界主义的眼光；同时，它也与一个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官府的教会相关联。在苏黎世，宗教改革是本土精英通过自己的市议会完成的事业。在这里，教会始终从属于国家，而对外国难民的开放则来得更晚、更谨慎。因此，这两座城市以不同的市民控制与国际开放的组合进入近代早期，这些差异至今仍可在它们金融中心的特质中感受到。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 cn.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legacy-for-the-financial-centre-2